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思政教师再定位

■ 谭海波

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正不断重塑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人才需求等方面，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运行及教育实践中，学生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形成价值判断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以往思政教学中以知识传递、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师角色，已无法完全适应新的育人环境。在此情况下，思政教师要重新审视自身专业定位，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要提高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议题分析能力及综合育人能力。基于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对思政教师进行再定位，绝非简单的教学手段更新，而是育人理念、知识结构、职责边界三者的共同调整。只有对技术变革和学生发展新特点持正视态度，思政教师才能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为培育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知识传授者转向数字化思政教学的创新引领者。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在持续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过去，思政教师多担负理论知识传授和思想观点阐述工作，在课堂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在信息供给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愈发多样，信息来源也呈现碎片化、多元化特征，单靠课堂讲授已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面对这种变化，思政教师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教学作用，由原来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数字化思政教学的创新引领者。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教师理论指导作用减弱，而是在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使教师更加积极地使用数字技术改善教学过程。数字平台可以整合文字、图像、视频等各方面的资源，大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学生的学情，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以及精准反馈。思政教师要依照课程内容及学生特点，挑选恰当的数字化工具，将理论知识同现实案例、社会热点、实践素材有机融合，让原本较为抽象的理论内容同学生的生活经验产生联系，加强课堂互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与此同时，数字化教学环境又对思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空间信息量巨大，观点表达也越发繁杂，一些片面化、碎片化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很容易干扰学生的价值判断。思政教师除要掌握基本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外，必须具备较强的信息筛选、资源整合、价值辨别能力，在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知。

从单一育人者转向学生成长发展的价值引导者。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未来社会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劳动者，也会更加重视具有创新意识、责任感、实践能力、正确价值观的人才。目前，高校学生成长所处的社会环境比以前复杂得多，新技术不断改变着职业形态和生活方式，也给青年学生学习、就业和个人发展带来了更多选择。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情况，思政教师要多去关注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困惑、价值需求等内容，由原来相对单一的育人角色向学生成长发展的价值引领者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新质生产力越重视创新发展，就越需要人才有坚定的追求价值和责任担当。尤其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当下，学生会更加看重个人能力提升以及职业竞争，很容易受功利化、片面化价值观影响。思政教师要立足学生现实成长需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个人发展同国家发展的关系，在关注专业能力提高的同时理解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色定位要求思政教师改变以往相对单一的教育方式，重视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同学生在知识基础、成长经历、发展目标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别，思想困惑也各有不同。思政教师要主动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社会认识等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把宏观理论转化为学生可以理解、思考的具体问题。

从课堂主导者转向多元协同育人格局的组织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系统协同的特征，它不是某个领域的一次性突破，而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共同推动的结果。与之对应的是思政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课堂，而应该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教育生态的变化，促进各种教育资源的有机衔接。长期以来，思政教师一直把课堂作为基本教学阵地，在理论讲授和价值引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模式具备明显优势，但是随着学生成长环境、学习方式的变化，仅靠思政课堂已无法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全部需求。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思政教师应该由课堂的主导者转变为多元协同育人格局的组织者、推动者。多元协同育人就是有机整合校内外各种资源，形成一个以共同的育人目标为指引、内容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育人系统。高校内部专业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和学生组织在各个阶段都可以发挥育人作用。思政教师可以依托自身理论优势，加强同专业课程教师的交流，把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实践、行业变化等现实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依托社会实践基地、科技企业、红色教育场所、公共文化资源等，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认识社会、认识产业，可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价值教育摆脱空洞说教。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杨冰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深刻改变思想互动的场景，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带来了深刻冲击。因此，分析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体系建构面临的挑战并探索应对策略，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核心概念界定。话语权理论可追溯至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权力论”与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福柯认为，话语并非单纯的语言表达，而是与权力紧密绑定的社会实践，掌握话语生产的规则即能主导社会认知与思想互动。哈贝马斯则强调，有效的话语互动需满足“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大有效性要求，即话语内容需符合事实、价值导向需正确、表达态度需真诚。这一观点为数字化时代思政话语的内容创新提供了标准，只有摆脱“单向灌输”的模式，构建基于平等互动的话语关系，才能提升思政话语的说服力，增进受众认同感。

思政教育话语权是思政教育主体通过话语传播，引导受众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思想认知、价值认同与行为选择的权力，其本质是思政话语影响力的实现。数字化场景下，其内涵已从传统的单向输出权拓展为内容生产权、传播主导权、意义阐释权、舆论引导权四大核心维度，这要求思政教育主体要产出适配数字化传播、贴合青年需求的话语内容，主导数字传播路径与范围，阐释主流价值、引导舆论走向，凝聚思想共识。四大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话语权的完整体系。

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话语主导权被稀释。数字化时代，算法推荐成为信息传播的核心路径，其“个性化推送”特性催生了“信息茧房”，青年长期接触符合自身兴趣的信息，对主流思政话语的接触意愿大幅下降。短视频平台算法优先推送娱乐、生活类内容，思政类内容由于缺乏吸引力，难以进入青年的视野；同时，青年群体通过共同兴趣形成固定圈层，而圈层内部的话语体系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主流思政话语难以突破“圈层壁垒”。这种“信息茧房”与“圈层壁垒”的叠加，导致主流思政话语的传播路径与传播范围被大幅压缩，话语主导权逐渐被稀释。

话语公信力遭受冲击。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开放性与匿名性特征，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多元话语交织碰撞的公共空间，部分错误社会思潮与差异化价值观点在网络空间快速扩散，这些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点借助个性化叙事、生活化表达迅速进行传播，当主流话语未能及时对热点议题、思想困惑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时，容易使青年对主流价值导向产生错误理解，进而削弱思政话语的信服力与认同度。

话语传播力存在瓶颈。话语传播力取决于话语表达与传播氛围的适配性。数字化时代，传播氛围呈现出“娱乐化”“轻量化”“互动化”的特征，青年更倾向于通过短时长、强互动、趣味性的内容获取信息。然而，传统思政话语以文本化、理论化表达方式为主，信息密度过高，互动性不足，难以适配青年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场景和互动需求。同时，传统思政话语以宏大叙事为主，往往聚焦国家政策、历史发展等宏观议题，而数字化时代青年更关注微观叙事，即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具体问题。

话语反馈机制滞后。有效的话语互动需要及时的反馈。数字化时代青年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分散化、动态化”的特征，其话语表达分散在微博、知乎、B站、微信社群等平台，增加了思政教育主体全面捕捉其思想动态的难度。同时，青年的思想需求随社会热点、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快速调整，且表达多为碎片化，缺乏系统阐述，进一步增加了反馈的难度。反馈机制的滞后导致思政话语无法精准适配青年需求，难以形成有效互动，最终陷入“单向输出、缺乏反馈”的困境，进一步削弱思政教育话语权。

数字化时代提升思政教育话语权的策略。数字化时代，必须以话语权理论为指引，立足“主体—内容—载体—受众”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推动思政教育话语体系与数字化传播深度融合，全面重塑主流话语的影响力、阐释力与引导力。

提升教育主体数字化素养。针对当前部分教育主体存在数字能力不足、理念滞后等问题，需从思维培育与技能提升两方面开展系统性培训：在思维培育方面，要系统开展数字思维与圈层思维训练，引导思政教育主体树立平等互动、精准适配、即时响应的现代话语思维；在技能提升方面，要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化素养培育体系，围绕数字化内容创作、网络舆情研判、线上互动引导等方向开展专项培训，补齐数字传播技能短板，推动思政教育工作者从“传统理论传播者”向“数字化话语引领者”转型。

推动思政话语内容创新。数字化时代，要推动思政话语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生活化、场景化、情感化表达。一方面，将国家政策、主流价值等宏大叙事，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理解、可认同的生活叙事，围绕青年高频关注话题，将理论阐释融入实际生活中，实现“大道理”与“小生活”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调研等方式常态化把握青年群体思想动态，使思政内容更加符合青年喜好。同时，强化情感叙事与价值隐性融入，以真实故事、平凡榜样为切入点，在情感共鸣中传递主流价值，避免生硬说教与形式化表达，切实增强思政话语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优化思政话语传播路径。传统线性、单一化的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必须构建分层分类、全场景覆盖的传播体系。首先，根据不同数字传播平台的功能定位与受众特征，实施差异化内容供给与传播设计，避免内容同质化与形式单一化带来的传播壁垒。其次，聚焦青年群体的圈层化聚集特征，开展针对性话语融入与价值引导，推动思政话语从外部输入转向内部认同。最后，统筹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推动校园阵地、社会资源与数字载体协同联动，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专业与大众相互衔接的传播网络，持续拓宽思政话语的传播范围与穿透力。

完善话语反馈与监管数字化机制。针对反馈滞后、监管薄弱等问题，构建数字化、智能化、闭环化运行体系。在反馈机制上，依托大数据整合多平台信息，全面采集青年思想动态与意见，通过智能分析快速提炼核心需求与潜在问题，建立“需求捕捉—内容调整—效果评估—持续优化”的响应机制，实现思政话语与青年需求动态适配。在监管机制上，运用智能识别工具提升错误思潮与不良信息的早期发现能力，搭建跨平台协同监管机制实现全平台追踪与快速处置；同时，转变“重封堵、轻引导”的传统思路，在风险处置的同时开展针对性思想引导，既筑牢网络空间风险防线，又维护主流思政话语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为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稳定提升提供长效保障。

数字化时代为思政教育话语权的构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现实困境，必须从提升教育主体数字化能力、推动思政话语内容创新、优化传播路径及完善反馈与监管机制等方面入手，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红色劳动资源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的价值与路径

■ 郝晓蒙 王恩惠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从技能型向创新型转型的时代要求。高校大思政育人承担着培养具有坚定信念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而红色劳动资源是落实这一育人使命的重要素材，其“奋斗、担当、创造”的精神内核与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高度契合。但在具体实践中，思政课程内容碎片化、实践体验表层化、评价方式单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需从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两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红色劳动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的价值意蕴。第一，为夯实新质生产力理论认同提供历史支撑。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学理根脉源自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红色劳动资源中的典型叙事，涵盖革命年代的“自力更生”型劳动、建设时期的“产业报国”型劳动、新时代的“科技赋能”型劳动，形成了一条由“劳动创造历史”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完整认知链条。将这一链条嵌入大思政育人，能使学生在历史情境中理解生产力跃迁的内在逻辑，把抽象的理论变成可感的经验，破解思政内容理论阐释碎片化的难题，实现价值引领和理论阐释的有机统一。

第二，为涵育新质生产力创新品格提供精神滋养。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要求不仅在于技术能力提升，更强调精神品格的重塑。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敢于突破、勇于探索的创新意识，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人才的精神底色。红色劳动资源蕴含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传统，并非创新活动的道德附着，而是推动创新劳动持续深化的动力源泉。把红色劳动精神融入大思政育人，实质上是为创新能力的生成筑牢价值锚点，引导学生在追逐技术突破的过程中保持对劳动价值的敬畏，在反复钻研中锤炼执着专注的品格，在攻坚克难中激发勇于探索的锐气。

第三，为锻造新质生产力实践能力提供检验依据。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实践能力的要求，体现为创新思维、实践操作、协作能力三者的有机统一。但是目前大思政育人评价以知识考核为核心，难以有效衡量上述能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红色劳动资源包含的操作规范、突破意识和协作观念，为实践能力的检验提供了可观测的参照，如操作规范对应实践操作，突破意识对应创新思维，协作观念对应团队协作。将红色劳动资源转化为评价要素，即以这套劳动标准作为评判依据，考察学生在实践研学、技能训练、创新项目中的真实能力发展状态，推动大思政育人由课堂延伸至社会实践，实现价值传导和能力生成的有机统一。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红色劳动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的实践路径。第一，课程建设夯实新质生产力理论认同。针对思政课程内容碎片化的问题，可构建红色劳动与新质生产力相结合的模块化专题课程。具体来说，在思政课必修模块中设置“中国共产党劳动实践与生产力跃迁”专题，以红色劳动典型案例为素材，系统讲解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逻辑、历史基础和现实指向，使学生从党百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中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必然性。课程设计要重视叙事性和理论性的统一，把红色劳动叙事作为认知起点，以理论阐释作为落脚点，避免把红色劳动资源仅作为点缀性案例，促使其转化为支撑理论认知的实质性内容，真正夯实学生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同。

第二，实践平台涵育新质生产力创新品格。对于实践体验表层化的问题，可搭建“劳模工匠进课堂”沉浸式实践教学平台。具体而言，邀请劳模工匠、技术能手参与大思政实践教学，通过“劳模面对面”“匠人工作坊”等形式，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体会“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在聆听劳模技术攻关经历的过程中理解执着专注何以成为创新劳动的精神基础。不同于普通参观式实践，该平台依托榜样示范与学生亲身参与，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劳动情境下的认识构建，推动学生对红色劳动精神从“知道”走向“体认”，从而将红色劳动精神内化为自身的创新品格。平台创建要健全常态化运行机制，将劳模工匠进课堂纳入大思政实践教学体系，保证精神涵育的连续性与实效性。

第三，评价机制检验新质生产力实践能力。针对学生实践能力难以量化测评的问题，核心策略是创建“红色劳动标准+创新实践能力”的观测体系。目前大思政育人评价偏重知识考核，难以有效测评学生创新思维、实践操作、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该框架把红色劳动资源蕴含的操作规范、突破意识、协作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评价指标，分别对应实践操作、创新思维、协作能力三个方面。评价方式上，可以利用智慧思政平台记录学生在实践研学、技能训练、创新项目中的行为数据，建立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相结合的动态反馈机制。评价结果应反向推动课程内容和实践设计不断改进，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完整闭环。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红色劳动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通过课程建设、实践平台、评价机制三条路径，分别在夯实理论认同、涵育创新品格、锻造实践能力三个维度发挥独特作用，实现从“育人素材”向“育人机制”的跃迁，能够有力回应新时代培育创新型劳动者的育人命题。

（郝晓蒙单位：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恩惠单位：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包钢以法治合规夯实新型工业化根基的实践路径

■ 黄烁轩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新型工业化不只是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也涉及制度层面的深刻调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首次明确，“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这意味着合规管理从部门规章层面进入基础性法律层面。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法治的规范、保障和引领。包钢集团是新中国在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的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近年来从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入手，探索出法治赋能工业现代化的路径。

法治是工业创新的稳定支撑。工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对创新收益的稳定预期。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成果排他性权利，使企业投入研发的收益得到保障。包钢集团旗下拥有北方稀土等上市公司，在稀土钢、稀土功能材料等领域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包钢集团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胡明哲带领团队严把重大决策法律审查关，审核覆盖率达到100%，在自治区国企中率先实现合规审查全覆盖，并推动北方稀土成为自治区首家通过ISO 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认证的上市公司。从包钢的做法看，合规管理并没有束缚创新，反而通过规范决策流程、保护知识产权、防范技术流失风险，为创新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如果缺少法治的约束，创新成果容易流失，工业升级的动力也会减弱。

法治为国企治理划定权责边界。国有企业是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其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工业体系的运行效率。包钢集团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注重顶层设计，设立合规管理委员会、首席合规官、合规管理员，构建合规管理“三道防线”，建立起协同运行的管理架构。包钢集团还编制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规管理“四张清单”，即法律法规清单、合规风险清单、重点岗位职责清单和流程管控清单，把合规要求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检查、可追责的具体规范。在改革深化方面，包钢集团按照新公司法要求，通过修订公司章程明晰各治理主体的职能定位，明确了“经理层研究提出、党委会前置研究、董事会审议决策、经理层执行落实”的议事决策程序。将法律规范转化为治理机制，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在法治框架内各有归属、相互协调，为工业企业稳健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法治为工业管理效能提供数字化支撑。合规管理能否见效，关键在于执行；执行效率高低，又与管理手段是否现代化密切相关。包钢集团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合同管理，搭建起“横向协同与纵向分级管理”的法务管理集团管控系统，把各子公司的管理规范纳入统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包钢集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AI智慧平台实现合同风险排查与新制度合规核验的智能化，平台可以识别潜在风险，并核验其与上位法及集团现有规章的契合度。数字技术与法治规则结合后，合规管理逐步由人工审查转向智能审查，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这种法治与数智结合的管理方式，为大型工业企业合规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路径，也说明新型工业化中制度优势需要借助技术手段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真正落地，推动企业法治建设迭代升级，以数智法治护航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不能只靠产业政策和技术攻关，也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工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从“三道防线”到“四张清单”，从双标准认证到AI智能审查，包钢集团把合规管理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工业竞争的现实优势。包钢集团的做法说明，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并非孤立的法务工作，而是贯穿企业治理、创新保护、风险防控和效能提升的全过程。总而言之，把法治要求融入工业发展全过程，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才能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社长：徐金宝 办公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翔鹰大厦15层1501 邮政编码：100043 ■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103号 广告、发行：(010)67410683 通联、投稿：(010)67410633 ■每周一出版 全年订阅432.00元 零售每份9.00元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